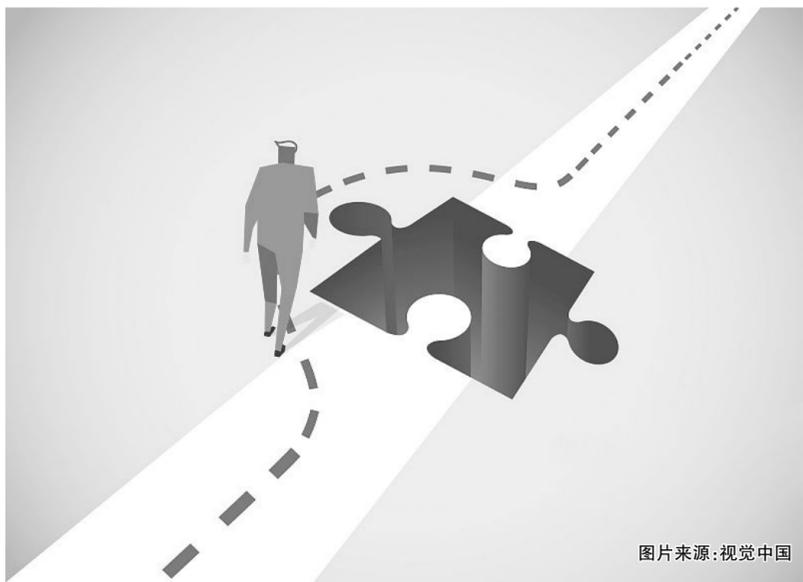


招生制度过度偏重技术环节的设计,却忘记了问问家长、考生的需求和困惑是什么。现在,政府部门与其提供更多的志愿选择,不如提供更高效率的配套服务。

# 志愿填报缘何越来越难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久前,一条“高考646分上三本院校”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了热议。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学院已经存在十多年,浙江省为了配合高考改革,组织了两次模拟填报,学校也反复强调独立学院与母体院校的区别,但还是出现了个别考生高分低报的情况。

如果是符合学生心意的个人选择,高分低报并不是一件坏事。倘若还有其他原因,把它解释为“小概率事件”也未尝不可,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背后反映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近些年,大学录取程序变动频繁,且日益复杂,就连业内人士也不见得能适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感慨道。

与他有一样感慨的,还有北京的陈女士,为了让孩子在“小升初”中顺利择校,她已经听了五场讲座。而高考对她来说是一场更大的信息“战役”——“处处是坑,不敢乱入”。

## 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

“我知道‘平行志愿’,但浙江省按专业录取是什么?”采访中,部分受访者有如此疑问。

《中国科学报》记者简单解释道,浙江省的按专业录取,就是将过去的“院校平行”改为“院校+专业”平行。比如,第一个专业填报浙江大学的数学,第二个专业是厦门大学的财政学,第三个专业又可以是浙江大学的材料学。遵循平行志愿的原则,参考考生的分数、填报志愿的顺序,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如此,受访者才有了模糊的概念。当然,要彻底搞清浙江省的录取模式,前提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平行志愿”。

毋庸置疑,浙江省采用按专业录取的模式,初衷是为了增加考生的选择性,以降低填报志愿的差错率,但却忽略了选择过多本身也是一种负担。记者了解到,浙江省今年可选择的高校达1000多所,可选择的专业达23000多个,倘若家长、考生没有明确的志愿方向,要想在短时间内做海量的功课,哪怕是总量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几乎都是不现实的。

一下子砸下来80个志愿,等着考生、家长去填写,很难称得上“理性选择”。“首先,家长和考生难以一一了解数量如此庞大的专业,无力逐一筛选这些专业。其次,与个人兴趣、特长匹配的专业也没有那么多,到最后为了凑数,难免出现‘为了选而选’的情况。”侯定凯说。

80个志愿的“红利”能否在现实中被使用得当?不久前,就有考生、家长通过媒体反映,填到60多个志愿的时候,“实在是填不下去了”。

实际上,浙江高考改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尽管典型,但只是整个高考录取设计环节的冰山一角。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环节设计,导致越来越多的“陈女士”出现,他们去听讲座、参加高招咨询会,搬回来一堆资料,指导孩子模拟填报,到最后,最易忽略的往往是基本的问题,比如,把独立学院与分校的概念混淆。

那么,技术手段之所以越来越复杂,又是为

什么呢?

## 政府包办致问题频出

招考未分离,在中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长期以来,在高考录取问题上,政府实际在替高校完成招生工作。

侯定凯指出,如今考生、家长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高校也有自身选拔人才的需要,然而,由政府一家来替那么多的教育消费者和高校来设计录取程序,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需求,就不得不在技术层面设计得非常复杂,以便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但是,因为政策变动快,来不及反思和积累经验,政策实施的潜在风险很大。“因为不可能由一家去满足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诉求,政府所做的恰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招生制度过度偏重技术环节的设计,却忘记了问问家长、考生的需求和困惑是什么。”侯定凯说,“现在,政府部门与其提供更多的志愿选择,不如提供更高效率的配套服务。”

不得不提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录取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指出,在录取环节,考生毫无疑问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农村地区,考生对于全国高校的了解情况严重不足。还有一种需求,受限于政策过于刚性,有意思的是,它不是表现为过于复杂,而是太过单一。

今年一名考生误报南昌大学专科,经与校方协商,校方同意退档,高校如此人性化的做法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按照现行的招生政策,学生被录

取之后,学校不能退档,考生不能毁约。也即,学生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别敦荣告诉记者,如果考生恰恰被平行志愿中最不喜欢的专业录取,从政策角度不可以反悔,但从人性角度可以反悔。这本应该是招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考虑到社会上不公平的争议之声,现行政策把正常现象一刀切——都不允许,这反映出政策过于刚性、机械。

## 提供人才培养信息是政府的“份内工作”

当前,谁最应该为志愿填报的信息服务提供支持呢?在采访中,所有的受访者均指向政府。

别敦荣表示,高招部门不能只是考试、公布分数的机构,所公布的信息也不能只是简单的招考信息,“而应该是高教信息与高招信息”。高招部门虽告知了前几年院校的录取情况,但是考生仍然无法据此判断学校的学科优势、教学质量、就业状况等,像这样作没有背景信息的判断是盲目的。

在他看来,基本信息不足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之一,怎样提供关于学校、填报志愿相关的信息,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的信息,应该是政府部门的“份内工作”。

然而,我国不缺少关注科研、学科排名的高校排行榜,但对于考生将来发展最关键的参考指标——本科教学质量、就业质量,这方面的信息反而是零碎的。

却在这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例子。据侯定凯介绍,英国政府于6月发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大学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旨在为考生择校提

供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份报告向社会公布了130多所高校教学质量、教学支持满意度(图书馆、教室、课外辅导)、就业质量等方面的评估结果,包括各高校教学和学生服务工作的质量。

有意思的是,在本次英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中,不起眼的利物浦希望大学、皇家兽医学院排名靠前,而公众知晓高的名校,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反而落在了后面。

“把这样的数据交给考生,他们在决策的时候才有更多依据。”侯定凯说。

事实上,中国也不乏学生满意度高而知名度一般的高校,如四川美术学院的就业质量、创业率均不错,人才培养也有特色。“这样的学校,政府应该鼓励宣传,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大学录取政策不能仅仅以把不同考分的学生‘精确’安插到现有的大学序列中作为目标,而应该从整体上服务于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以此保障高校个性化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侯定凯补充道。

## 高校招生宣传要强调比较优势

福建某中学教师林觉对高校招生宣传有一个基本印象——“抓不住重点”,比如,大学宣传手册上总是写着科研有多好、就业有多棒。考生、家长们抱回一摞资料,但他们最关心的校园服务设施、教学质量、就业的比较优势却是“笔墨稀疏”。

在采访中,别敦荣、侯定凯均指出,高校招生工作最终还是由由政府统一安排回到各高校负责。然而,在政府分配学生的模式下,高校招生部门的自主权很小。“高校宣不宣传实际上对学校的意义并不大,只有在自主招生、提前批次录取环节,吸引高分考生报考的时候才有一定作用。”别敦荣说。

别敦荣、侯定凯均认为,招生宣传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强调高校的优势,而是要强调与众不同的自身优势,比如,教学型大学如何关注学生的发展,学生服务、就业比其他学校强在哪儿等。

“通俗地说,高校要会讲故事,把学校的传奇、历史、影响力通过故事让大家了解,让大家愿意以查阅的形式来了解学校的情况。”别敦荣补充道。

事实上,高校也有接地气的行为,如每年派招生代表赴属地招生。但跨省招生中,一所高校往往只有一个招生代表,要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找到了招生代表,对于在学校都怕跟老师打招呼的中学生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见大学招生代表就像是去见“大人物”一样,胆怯的心理让不少学生、家长“望而却步”。对此,林觉深有体会。

如何鼓励考生大胆地向招生代表咨询,应是高校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侯定凯建议,高校在现场招生宣传时,派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现身说法,以吸引更多考生、家长的关注。但即便如此,受众面依然过小。借鉴商业机构的营销手段,在高校官网设置点击、在线客服等互动手段,这在他看来是一个好办法,“至少让人感觉亲切,考生也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个性化的解答”。

## 中国大学评论

日前,媒体曝出四川成都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要争创国家“3A级景区”的消息,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其实,看看全国各大学的招生宣传手册,拥有国家“3A级景区”的学校还真不算少。只要傍一处山,拥一片湖,再移些大树,种些绿植、花草就敢申请,一旦获批便成了招揽学生报考的噱头之一。

这几年,人们喜欢引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大师、大楼”说,为的是针砭重大楼而轻人才的现象。现在看来,“唯大楼”说又出了新品种,不仅是要盖更高大、更宏伟的楼宇群,还要争创“景区”,真是“这世界变化快”!

当然,大学确也有其苦衷。以现有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旅游城市,地方行政部门一向是鼓励大学景区化,而一旦景区化就必然要尽景区的义务,这也是大学“为地方建设服务”的一部分。

其实,人们对于所谓“3A级景区”的不满,并非反对美化校园,而是说,不要以美化校园为名去自加砝码,申请国家旅游管理部门针对自然或人文景区而设立的有关认证。因为这种认证不仅与学校的教育无关,也会耗费无谓的精力,产生无谓的费用。

但问题是,类似的认证、申请所代表的教育以外的各种名目正在成为大学行政部门的一种追求,而这种追求又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转型、经济的多元化、人们追求的多样化的趋势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

大学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要影响社会,必然同时受到社会的影响。这种互动也容易让大学的追求变得多向。因此,它又涉及大学如何与社会保持关系的难题,成了暂时无解或无法界定的灰色地带。

当下中国,“抛开书本”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的“读书无用论”已然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教育领域以外的,诸如企业家、创业者、行政官员和影视明星,从事实际工作的“成功人士”在媒体上自信满满地鼓吹书本知识的无用,在他们看来,“见识比知识更重要”似乎不仅仅是一句影响人生的箴言,更是决定未来事业成功与否的秘诀。

不能说这种言论或倾向对于大学管理者有直接或实质的影响,但就大学的现状看,社会的倾向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大学追随的时尚,因而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本来就对学问缺乏真正的兴趣、对教育缺乏热情和理想的管理者从事教育的信心。而所谓的多向追求,只能算是一种有关教育的信心失去之后的心理补偿。

事实上,“成功人士”所谓“见识比知识更重要”中的“见识”,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知识”组成的。“知识”既是“见识”的基础,又是“见识”深化的助推器。将二者对立,不仅不能显示见多识广,反而暴露出本身“知识”的欠缺和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无知者无畏”。

既然从事具体工作的“成功人士”可以认为实践或社会见识才是最有效的教育,那么,大学教育的从业者为何不能做信手拈来知识才是大学生教育(学)最基本的一面?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基本面的局限或者弊病,但不能离开这个基本面而去另立一个新的基本面。如果那样的话,等于是将大学及其教育彻底地解构了。

对知识的信仰和“人的教育”永远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多向的追求只是为了丰富大学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并不能代替或者取代大学的教育、教学。这就像放出的风筝,品种再多、线索再繁,最后都要收回到手中的线轮之上,这个线轮就是大学的本质属性。

任何以多向、多元和多样为旗号对以往单一的办学模式的矫正、纠偏,都需要照顾到这个本质属性,围绕并且服务于这个本质属性,这应该是一个需要遵循的“度”。过犹不及,过当则欠,失败的经验教训古人早就在总结了。

大学当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唯一追求。对个体而言,不上大学完全是一种选择,它可能并不会影响其前途。但经历过大学教育的人与未经历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所不同,这一点大概那些曾有大学经历现在又鄙夷大学书本知识的“成功人士”也是不会否认的。明白于此,大学的从业者怎么会没有那一点点自豪感呢?因为这就是大学教育的价值实实在体现在,也是教师的劳动获得的精神安慰和精神回报。

# 多向追求与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

■尤小立

## 现场

# 六国大学生共建“澜湄家园”

■本报记者 黄辛

不久前,在澜沧江—湄公河首届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上,来自老挝国立大学的万赛·朋塔杰、越南外交学院的武昆创和广西财经学院的唐励很是欣喜,因为他们不仅顺利结业,还获得本届训练营的“最佳表现奖”。与他们同时结业的还有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6国8所高校的32名大学生。

“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一起,做对了一件事情。”活动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书记方明说。两年间,这项活动不断升级,从单纯的夏令营发展成了6国青年“头脑风暴”,为流域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2015年8月,受当地政府邀请,复旦大学组织了6国官员、学者和学生代表共70余人,在澜沧江源头实地考察、立碑纪念。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环保合作”为主题的“国际大学生玉树夏令营”结束后,一个更宏大的想法开始酝酿。

“夏令营做完以后,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到源头去,因为有一种文化上追根溯源的朝圣式的心态,这种心态打动了我们。”方明说。从2015年的玉树夏令营到2016年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创业设计大赛,来自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国青年和专家学者齐聚玉树,不断促进6国友好交流和流域共同治理。

## 共担建设“澜湄家园”之责

“澜湄”,澜沧江—湄公河的简称。澜沧江起源于青海玉树杂多,流经西藏、云南,从西双版纳出境后改称为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共4880公里,最后流入南海。近年来,流域的保护、治理和开发,沿岸各国的经贸合作

与文化交流,备受各方关注。这项比赛全名为“澜沧江—湄公河之约”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创业设计大赛”,简单而言,是6国大学生组队提出自己的创新方案,以期解决地区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国际河流的治理出谋划策。

万赛·朋塔杰和两位队员参加了第二届比赛。由于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其残留物随降雨进入河流,导致湄公河流域水质富营养化严重,万赛·朋塔杰和同学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班兰叶可以吸收75%的硝酸盐和95%的磷,因此设计出利用班兰叶降低水质富营养化的方案。

在为期3年的项目周期内,万赛·朋塔杰团队计划建立试点,组织研发推广班兰叶产品,以期实现净化湄公河水质的目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由夏令营发展而来的这项赛事,一诞生就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目前,该赛事已被教育部纳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度活动安排,成为澜湄6国政府认可的国际活动。

“青年人最富朝气和梦想,也最容易相互沟通和理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6国间的民心相通,青年的交流合作尤为关键。”在赛事首次训练营启动仪式上,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西明致辞时说。

6国青年代表步行抵达源头后,在纪念碑前,用英文发出了倡议,共同努力建设“澜湄家园”。

## 展示创新创业新成果

训练营邀请了前两次决赛的优胜队伍,包括8所高校的35名青年。他们将展示最新的项目成果,并在训练营进一步获得专家指导,乃至专业力量的孵化。

“最初的制度设计就有这个环节,不能赛完了

就结束了,要把问题变为行动。”方明说。

在训练营中,6国学生在演讲环节展示了对于流域治理孵化优秀项目方案的设计。

“我们尝试利用水井和水过滤系统帮助社区中的人们健康、实惠、高效地利用水资源,并希望可以与社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筹资并借鉴新技术来落实这一方案。”来自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的团队成员如是说。

而在青海大学设计的澜湄咖啡屋环节,学员们以团队为单位,就项目进一步孵化与每一位专家和导师进行沟通。所有团队同时进行,每30分钟一次轮换,以达到所有团队和所有导师都能建立对话的目标。

来自中国广西财经学院的团队针对他们所提出的“澜湄流域建设气候减灾联盟建议”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进行了讨论。郑宇认为,政策创新富有现实意义,联盟的有效运作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机制。

在展示和交流之后,导师们通过创新创业公开课给予学员有针对性的指导。课程分为“创业孵化”“公益孵化”和“政策创新”三类,每节课都包括导师讲授与问答互动两个环节。

“好的方案要想真正孵化落地,需要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处理好各个方向上的关系。”创业导师团团长、上海华王集团董事长陈庐一希望导师可以成为学员的引路人,也希望学员把创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坚持下去。

## “多方合作”学生成“主角”

“多方协作是训练营生根发芽的土壤,也是大



六国青年代表向“澜沧江—湄公河之约”纪念碑敬献哈达。

闫一平摄

赛两年来枝繁叶茂的保障。”方明说,此次训练营项目几乎完全由学生团队自主运行。从设计到筹备的半年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大三、大四的学生成为了主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本科生俞佳慧负责所有与会人员行程的安排和机票、住宿的预定,她坦言,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保证四百个航班信息的准确无误。在她看来,虽然是琐碎而细小的事情,但对自己成长大有裨益。

“赛事的筹备过程也是学生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在真实的情境中,在与多国嘉宾、专家学者和学生的沟通中,我们希望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工作能力,这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说。

“同时,我们也希望该项目能够成为青年关注区域环境治理与发展的样板,为将来类似的全球性青年环境治理与发展大赛提供参考和经验。”方明补充道。

据悉,2018年1月,这项活动将第一次走出中国在老挝举行,从而开启6国轮流主办的机制。